

▶▶▶ [上接6月4日A3版]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

■ 邱海平



习近平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和范畴，而且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阶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习近平时代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阶段。因此，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可行性问题，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出发，从而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联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独特性、创造性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所提供的丰富实践经验和事实依据。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并借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时间太短，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创造性，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成就、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并根据这些理由来否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

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世界上的崭新地位，从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

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建设，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总收入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在尖端科技、教育发展、产业制造能力、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灭贫困、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深陷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前景很不乐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能否实现理论创新，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最终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没有理论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引领地位，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及其现状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主要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8年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首先仍然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主，但同时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同时并存，但是“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步取得了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权地位。2008年之后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由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学开始进入第三个新的发展阶段。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虚心向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五四运动之后，首先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新中国建立之后，主要是向苏联学习；改革开放之后，再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中华民族得到了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使许多中国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再加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于是，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不正常现象。

自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无批判性地传播，以及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使得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理论认识和思想上的错误与堕落，是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为上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如何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如何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理论任务的现实背景。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史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相反，世界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上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取得引领地位，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从当代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

性。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解决这些弊端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虽然是由极为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应该承认，“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理论局限性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如前所述，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批评，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未能够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勇敢地走上了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征程。经过近40年的发展和探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实践属性，其中主要有：(1)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主动开展改革开放，同时拒绝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在稳定中改革和发展；(2)在坚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又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3)在坚持国家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统一领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大力发展战略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都得到发挥；(4)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勇敢地参与并引领世界经济，从而既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各方面经验和资源，又避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对于国家经济的过度冲击；(5)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依据条件的变化，动态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从而既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公平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已经在理论上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也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就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变种，也不可能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简单改版，更不可能是《资本论》的理论的改头换面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而必然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即不同于“苏联范式”的“中国范式”。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范式”阶段。明确地树立和确定这种“范式意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创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高度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创新的重点。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具有一般性的那些经济问题和规律，从而总是标榜自己的经济学具有“普世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差别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否定了国别差异，而且也否定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深刻地理解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但是，同时也忽略了国别差异及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影响。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来说，要建立一种完全以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似乎同样是不可议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只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同样不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

然而，我们恰恰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独树一帜的新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区别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第二，方法论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坚持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以及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这是对于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个巨大突破，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的同时，既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否则，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部分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其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完)

## 《市场营销人类学》对思想和观念转换的启迪

第二，从抽象的市场观向具体的交往观的转换。我们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不错的发展业绩，尝到了一些甜头，但由此也使得市场教条主义或市场形而上学甚嚣尘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市场万能和市场执迷问题又日益凸显。这种抽象的市场观严重忽视了市场交往中的种种具体形态和文化特质，在理论上虽然也能讲得头头是道，可一用到现实就处处碰壁，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越来越深刻严峻。该书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反思，对已经被市场抽象掉的许多重要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人类学还原，重新准确界定了市场作为工商时代具体和特殊的人类交往活动的位置，从而为我们树立起对市场的辩证认识和文化审思。这对于今后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发展无疑有巨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第三，从传统的营销观向现代的共享观的转换。由于受上述片面效率观和抽象市场观的影响，传统的营销观也出现了较大问题，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异化为或多或少的传销的性质，再加上简单模仿食洋不化的弊病，我们的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越来越面临挑战，步履维艰。该书从人类学视角对市场营销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审思，指认和强调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共享的营销理念，为我们今天的营销摆脱传销的阴影重归正确的轨道提供了有力的牵引。这也是对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发挥，对当

前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新时代全球化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资料丰富翔实横跨中西而又把握得游刃有余，分析的视野既高瞻远瞩而又细致入微，使得该书的许多章节精彩纷呈令人叹服。当然，作为一个学科综合，且理论实践并举而又分量较足的书籍，要做到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书中也有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和瑕疵。例如，因所论问题复杂多样，难免个别地方琐碎模糊，框架结构也有进一步提升和凝练的空间等等。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终究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值得经济学、人类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学习借鉴。

(完)